

舟山历史悠久,人文璀璨。笔者利用业余时间,历经一年多精心寻找挖掘了隐藏在舟山诸岛的120余块从宋至民国时期的古地雕,对其样貌进行了准确的描述,对其历史脉络进行了深入的梳理,对其蕴含的吉祥寓意进行了详尽的解析,撰成《舟山古地雕》一书。在整理图画成册的基础上,笔者发现,这些代表着中国传统审美的图案,早就包含着丰富的海洋元素,以此证明着舟山的发展是华夏文明的一脉,也是如今舟山挖掘海洋文化内涵的重要借鉴。

古地雕中的舟山元素

□尹海鹏

一、古地雕里的“舟山地理标志”——海水江崖纹

古地雕中多次出现明清时代官员官服补子中有的海水江崖纹,除了反映舟山先民对“江山永固”“福山寿海”的祝祷外,还反映了舟山独有的地理特征,表现了舟山先民“一图双关”的智慧。

海水江崖纹之三个立剑状山石即代表着“三神山”。所谓三神山指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:“齐人徐市上书,言海中有三神山,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,仙人居之。”而蓬莱、方丈、瀛洲,在舟山先民看来,向来和本土相关。民国岱山文人汤潜任《岱山镇志》写道“岱山本以乡名,自唐以来即称为蓬莱乡”。相传当年徐福曾到达岱山、东福山等岛寻找长生不死仙药,留下了种种传说。舟山百姓中也流传着岱山即蓬莱、衢山即瀛洲、东福山即方丈的说法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写下气象雄浑的《渔家傲》。这是在建炎四年,她追随皇帝赵构在舟山一带躲避金兵期间所作。词中“风休住,篷舟吹取三山去”之句表达了她对“三山”的向往,也可能舟山独特地理位置、海天风貌特别符合她心里是对“三山”的想象,便触景生情。如此看来,海水江崖纹中“滔滔海水中,中央有三山”,十分贴近舟山的地理风貌,舟山可以借鉴海水江崖纹设计形象的地理标志。

二、古地雕里有舟山的自然风光——荷塘景色

普陀山一些寺庙中的一块块古地雕,就是一幅幅平铺于地的自然山水画卷,从中可以看到荷花、荷叶、莲蓬、慈姑、芦苇、游鱼、水藻、海星、小蛇、螃蟹、蟾蜍、禽鸟、虾等动植物形象,将舟山群岛的自然风光特别是荷塘景色展示得淋漓尽致。诸如西天景区灵石庵圆通宝殿内古地雕,只见水纹涌动,水生植物枝繁叶茂,荷花竞开,两条鱼儿游戏水中,荷叶下,一只白鹭悠闲站立,一条小蛇悄无声息,盘绕其左腿之上。另一只白鹭见状,潜身欲探究究竟。身后,一只小螃蟹双钳上举,紧夹水芹菜,一只蟾蜍蹲在右角,默默注视;两只池鹭则在高处,一只静卧莲



龙头蝙蝠



蟹形荷花

梗仰头观望,欲要飞升,一只展翅飞来欲与相会。好一幅荷丛茂盛,禽鸟鱼虫竞自由的荷塘风景。

三、古地雕里有舟山的特色海鲜——螃蟹

螃蟹是舟山人最喜爱的海鲜之一,大约400年前,舟山石匠艺人就已经把螃蟹的造型刻在了地雕上。在普陀山妙庄严路进香古道上,一株560年古樟树下,一块石板上雕刻着一朵荷花,酷似一只螃蟹,背甲、蟹钳、蟹腿皆由荷花瓣组成。“蟹形荷花”反映了舟山先民将本地特产螃蟹融入荷花造型的独特智慧。此造型世所罕见,为普陀山独有,也为舟山独有。

四、古地雕里有罕见的吉祥瑞兽——龙头蝙蝠、文鳐鱼

古地雕里有舟山独有的吉祥瑞兽,比如龙头蝙蝠和文鳐鱼。龙头蝙蝠地雕,也在妙庄

严路古香道上。主图雕刻着一只长着龙头的蝙蝠,龙头刻画生动,须角分明,霸气威严,正张开大嘴,向下方喷水,溅起银锭一般的水花,从中可以看出瑞兽代表的福祉、兴隆、财富的吉祥寓意。这龙头蝙蝠形象独特,为普陀山独有,别地已找不到它的踪影,也许把传统的蝙蝠造型和龙结合在一起,是舟山人民的一种创意。

文鳐鱼地雕,在普陀区葫芦岛翁家路天后宫大门内地面上。只见水纹之上,荷丛茂盛,中间一张荷叶尤显硕大、挺立。荷叶之下,一对飞鱼(文鳐鱼)相对而飞。文鳐鱼是《山海经》中提到的水中瑞兽之一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:文鳐鱼像鲤鱼,却有鱼的身子和鸟的翅膀,它的身上有着青色的斑纹,长着白色的脑袋和红色的嘴巴,常常从西海巡游到东海,夜间飞行。它发出的声音就像鸾鸡的鸣叫,它的肉酸中带甜,吃了可以治疗癫痫病,它如果出现,天下一定会五谷丰登。瑞兽文鳐鱼纹样的出现,反映了舟山偏远海岛百姓对《山海经》的熟悉了解,彰显了舟山先民的文化自信。

五、古地雕里有普陀山传说——八仙过东海

在普陀山一直流传着八仙过海的传说,汉钟离、吕洞宾等八位神仙不用舟船,各自凭借法器过东海,不料惊动龙宫,引得龙王率众与八仙斗法,胜负难分之际,多亏观世音菩萨从中调停,双方才皆大欢喜。这个传说被清光绪年间的石匠艺人用地雕的形式记载了下来。在法雨寺前海会桥桥面的地雕上,可以见到外圆边框内环绕着八仙的八件法器,除此之外,下方一只金毛猿立于海浪波涛之上,青鳞直竖,颇具威势。其中海浪波涛代表东海;八件仙人法器暗指八仙;金毛猿为神兽之一,又名“朝天猿”,为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的坐骑,暗指观世音菩萨。在地雕中不会出现佛菩萨、神仙等形象,即使需要出现,也是以他们的坐骑、法器来代表,体现了古人对佛菩萨、神仙等圣贤的尊重、敬畏之心。在地雕上用八仙法器、观世音菩萨坐骑、海浪波涛的组合来反映八仙过海的传说,体现了当年石匠艺人匠心的独具。

社科之声

定海《公墙碑记》考释

□楼正豪 龚忆梦

《公墙碑记》原立于定海城隍庙附近,现收藏在舟山市档案馆,高206厘米、阔70厘米、厚15.5厘米,由王修植撰文、武联速书丹,立于清光绪十七年(1891)七月。碑额为“公墙碑记”,碑文作“定海公墙记”,石碑四边有人工凿刻痕迹,下方有一穿洞,可知此碑曾作他用。

公墙碑记 定海公墙记

古者民间门间垣墉之政,皆官为之治,随时戒约而申令之。故《小戴礼·月令篇》曰:“孟秋之月,命百官修宫室、坏墙垣。”自井田既废,而后民间造作皆听其自置,自此不复官为监举。此定海公墙之作,所不能不备书颠末,以志善政,述盛德,而为今世之民牧者劝也。定海向无公墙,光绪辛卯春二日,民房失慎成灾,人咸尊黄公海珊率夫役、会兵弁,竭力捍御,而阖闾鳞比,此熄彼然,燎原之势难施补救。火既灭,即出俸钱抚灾民,乃召诸父老,告曰:“吾比见火之作,凡遇高垣城墉,其势辄阻遏不得逞。今亡羊而补牢,未为迟也。其不可不亟筑公墙,以为各预不虞之地。”爰即以状,闻于大吏,并陈善后事。而中丞恭公、观察吴公亦先后间警委员勘验、抚恤。既而中丞复檄,委观察黄公海珊率千有六百圆,躬诣定海,为创造公墙之需。即派日,鸠工庀材,踰月而事竣。

墙既成,邑人谋所以久之者,属书于余。余曰:“夫众人可与乐成,难于图始。方火之作也,诸皆失丧,踵顶顾救不暇,方戚然,虑旋定安集之不易,而重欲兴大工、动大役,则莫不窃窃然议之,以为其事之迂,收效缓而成功难也。而黄公海珊独毅然决然,志在必行,行在必成,卒以收捍灾卫难之功,为绸缪先事之计。今向之议者,亦且□而乐之矣。其利赖于吾定之民者,岂浅鲜哉?”余既喜黄公之能师古,以为善政;尤喜中丞恭公、观察吴公能并成黄公之志,以保我桑梓,故乐为之书,而即以告今世之凡为民牧者也。

是役也,筑公墙凡八堵,为时凡两阅月,用民力不知凡几,糜洋泉凡四千七百十圆。以千金为定民托者,杭州善士丁君松生也;在上海劝

集,指率洋泉千圆恤灾民,继复以洋泉三千圆助筑公墙者,湖州善士施君少钦也;赏银来定而襄事者,少钦之子志仙及吾乡王司马克明、朱明府葆三也;始终董其事者,邑人林封翁感亭、高广文柳堂、孙中翰雪湖、陈孝廉怀之也;操畚尺监工者,邑人武司榘新余、朱明经萃夫、许明经召庐、金茂才壬甫、朱茂才捷三、白职员复三、陈上舍晓雯、郑上舍逢溪暨市上诸君也;颜墙之眉,而并书其颠末以勒之石者,太史氏王莛生也,皆例得备书。赐进士出身、翰林院庶吉士、邑人王修植撰。庠生邑人武联速书。光绪十七年七月日吉

碑文开篇道,古代修筑城门、城墙,皆由天子遣百官负责,随时监督、命令工程。故而引用《小戴礼记·月令篇》曰:“孟秋之月,命百官修宫室、坏墙垣。”自西周“井田制”废除,民间工事皆由地方自治,没有中央指派官员监举协助。因而定海修造公墙的缘故经过,不能不大书特书,以表彰善政盛德,可作为对当地地方官的勉励。定海过去没有公墙,光绪十七年(1891)正月初二,民房不慎失火成灾。当时定海直隶厅同知黄树藩(字海珊)率领官民竭力灭火,但是街道店铺鳞次栉比,此处熄灭、他处又燃,费尽周折才将大火扑灭,黄同知又出俸钱,安抚灾民。考虑到今后若有火情,难施补救,黄同知召集诸位父老,说道:“我见到大火燃起时,凡遇到高垣城垣阻隔,火势便能得到遏制。如今亡羊补牢,时未晚,应立即上修筑公共防火墙,以防不虞。”随即,黄同知写信向上级汇报,得到浙江巡抚叶赫松龄与宁绍道台吴福茨的积极响应,派人前来勘验、抚恤,后来叶赫松龄又复函委派吴福茨亲至定海,送六百洋圆以作创造公墙之需。立即选定吉日开建,过了一个月便竣工。

建成后,乡民为了公墙能够永存,请翰林院庶吉士王修植撰文立碑叙述缘由,他说:“对百姓而言,只能与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,而不能在开始时一起谋划。当火灾起时,大家皆是惊慌失措,不顾一切地救火,火灭后,民众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,紧接着马上又被动员兴工,没有人不悄悄地说,工程进度肯定缓慢而成功难。但是黄同知独毅然决然,志在必行、行在必成,终于建立公

墙,实现未雨绸缪的愿望,当初议论的人也乐观其成。此举依靠的都是定海百姓,谁说他们的力量是微薄的?”王修植最后表明自己乐于撰写碑记之目的,在于歌颂黄公能够效仿古代的贤官而作善政、巡抚叶赫松龄与宁绍道台吴福茨能够成全黄公心志而保我桑梓,他们都是当今父母官的好榜样。

碑文接着写道,这项工程修造了八道公墙,工期两个月,不知用了多少民力,共花费洋元四千七百十圆。捐献善士众多,有杭州丁松生、湖州施少钦与施志仙父子、定海王克明与朱葆三等。丁丙(1832~1899),字松生,晚清杭州著名士绅。太平天国战争时,因抢救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有功,任江苏候補知县,又加同知衔。但他并未赴任,而是以绅商、藏书家、慈善家等身份活动。他与杭州众士绅联合,创办当时全国最大的慈善救济组织“杭州善举联合会”。1889年,丁丙等人为振兴民族工业,在杭州拱宸桥西创建杭州通益公纱厂。太平天国战争之后,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恢复,主要也是丁丙整合各方资源并亲历亲为的成果。施善昌(1828~1896),字少钦,晚清上海丝织业和丝织品贸易的领导者,长期担任上海丝业会馆总董,主持上海仁济善堂,并将这两个机构都办成了全国性的筹款中心。定海人王克明与朱葆三(1848~1926)是晚清上海商界的重要人物,上海滩曾流传一句话“上海道台一颗印,不如葆三一封书”,他们致富后都不断回报家乡、造福桑梓。此外,从始至终的主事者有林感亭、高柳堂、孙雪湖、陈怀之;亲身参与工程者有武新余、朱萃夫、许召庐、金壬甫、朱捷三、白复三、陈晓雯、郑逢溪等等,都不应被忘记。

碑文最后,王修植说列举作过贡献之人,也得把撰写碑记的自己算上。王修植(1860~1902),字苑生,1890年赴京参加会试中第,是定海历史上最后一名进士,又通过“朝考”,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,王修植从舟山前往天津,1896年出任北洋大学头等学堂总办,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驱。书丹者武联速无考。

如今,定海城中还有四道公墙留存。

